

从波斯到中国：  
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王媛媛

中 华 书 局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 序

公元3世纪创建于波斯地区的摩尼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宗教的宗教”。摩尼把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说教都糅合到自己的“二宗三际”论中,再加上摩尼及其弟子们能写会画,使得这个晚出的宗教能够在几乎被其他三种“世界宗教”所覆盖的大地上,流传开来。但是摩尼教义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注定了它的命运不佳,于是教主殉难,教徒四散而逃,从波斯到中亚,从中亚到中国,在武周和开元时期,曾经在中原地区流传。以后又开教回鹘,盛行于高昌,流转于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到“大明”王朝,还有它的影子,而直到民国年间港台地区的黄历上的“蜜”字,也可以说是摩尼教的遗迹吧。

正是这样的缘由,摩尼教的传播史,也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11~1913年沙畹、伯希和翻译敦煌出土摩尼教残经并系统阐述摩尼教流行中国史事,1923年陈援庵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到1987年林悟殊出版《摩尼教及其东渐》,加之国内外学人的拾遗补阙,似乎摩尼教东渐史已经剩义无多。

然而,20世纪初叶以来,东方的吐鲁番、敦煌发现的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汉文的摩尼教文献残卷,以及在北非发现的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叙利亚文摩尼教文献,陆续整理、翻译出来,最近二三十年成绩尤为显著,可以让我们从摩尼教自身的文献中来探讨摩尼教的流传史了。所以,当2001年9月王媛媛来求学的时候,我看她外语好,悟性高,肯用功,就给了她摩尼教从中亚到中国流传史的旧题目,以及一批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版的有关摩尼教的新著作,希望她做出的论文能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王媛媛硕博连读,中间克服了“非典”的影响,2006年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现在又加以增订,从博士论文发展成专著。本书虽然也以摩尼教的传播史为线索,但她对于史事的讨论是植根在对摩尼教教义、摩尼教仪式、摩

尼教的教规等宗教内涵的理解之上的。为此，她通读了大量西方学者对于摩尼教原典的翻译，只要看看她那些标注了页码的大量西文论著就可一目了然。她在根据英文、德文翻译摩尼教经典时，都对照了摩尼教中亚写本的拉丁转写，因此也改正了克林凯特(H. -J. Klimkeit)英译本的一些错误。

在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一位正在研究祆教葬俗的老师忽然发问，摩尼教的丧葬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与她的博士论文完全无关，但老师是有权利问这样的问题的。只听媛媛原原本本地娓娓道来，详细地阐述了摩尼教的丧葬规定，那位老师听后说：我没有问题了，你可以毕业了。日本著名粟特语和摩尼教专家吉田豊教授看了王媛媛的博士论文后对我说，王媛媛大概是中国、日本所有东方学者中少有的几位真正懂得摩尼教教义的人，在海外研究摩尼教并对摩尼教教义有深入理解的业师张广达先生也有同样的评价。

每次到吐鲁番，在夕阳的照耀下，我总是望着那干燥的土地遐想：在一千年前，这里的摩尼教高僧，能够在这片佛教流行的焦灼土地上，把先知摩尼的“二宗三际”思想弘扬开来，他们一定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一千年后，虽然那些精美的插图本典籍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但由于数以万计，各种语言的文献相互补正，通过学者们近百年来不懈的努力，这些残片中蕴含的摩尼教义已经渐次表白出来。通过王媛媛的这本专著，读者不仅可以清晰透彻地了解摩尼教从波斯到中国的历程，而且还可以通过她精准的译语，来理解摩尼教的教义和仪轨。学术的积累和传承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代代不息的。

我虽然收集了不少摩尼教的研究著作，但无暇细读，于摩尼教教义所知甚少。今天看到王媛媛的专著杀青付梓，而她现在又执教于中山大学，可以随时得到摩尼教专家林悟殊先生的教诲，我感到无比欣慰。这里略述摩尼教东渐研究脉络，以及她从我治摩尼教史的缘故，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09年12月25日于大阪

# 目 录

序.....	荣新江	1
绪论 .....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3
第三节 资料运用与整体架构 .....		14
第一章 中亚及西域的摩尼教 .....		19
第一节 摩尼教在索格底亚那及其周边地区的 早期传播 .....		20
一、从波斯到索格底亚那 .....		20
二、吐火罗地区的摩尼教 .....		26
三、阿尔胡(Arghu)地区的摩尼教 .....		31
第二节 西域摩尼教 .....		43
一、西域北道的传播情况 .....		43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 .....		43
2. 漠北回鹘汗廷的摩尼教 .....		70
3. 北庭的摩尼教 .....		77
4. 高昌的摩尼教 .....		83
5. 龟兹的摩尼教 .....		90
6. 焉耆的摩尼教 .....		96
7. 于术的摩尼教 .....		100
8. 回鹘摩尼教女听者 .....		102
二、西域南道的传播情况 .....		106
1. 吐蕃国内的宗教环境 .....		106
2. 吐蕃在西域的宗教政策与摩尼教的零星踪迹 .....		108
篇末结语 .....		112

<b>第二章 唐代中原的摩尼教</b> .....	115
<b>第一节 武则天与摩尼教</b> .....	116
一、武则天接受摩尼教的原因 .....	116
二、武周时期的摩尼寺 .....	127
<b>第二节 开元七年的慕闍与法堂</b> .....	131
<b>第三节 摩尼教的开元禁断</b> .....	138
一、开元二十年禁令与密教 .....	139
二、佛教对摩尼教的排斥 .....	148
三、开元二十八年的“驱逐胡僧”事件 .....	156
<b>第四节 大历以后的中原摩尼寺</b> .....	159
一、对大云光明寺的考察 .....	159
1. 大历之前“大云”与“大云光明”的关系 .....	160
2. 有关“大云光明”寺额蕴意的揣测 .....	167
二、中原摩尼寺之间的关系 .....	171
<b>第五节 会昌法难中的摩尼教</b> .....	175
<b>篇末结语</b> .....	180
<b>第三章 高昌摩尼教</b> .....	183
<b>第一节 摩尼教文献的种类、语言及教徒的种族</b> .....	184
一、经典文书 .....	185
二、仪式文书 .....	190
三、教会文书 .....	192
四、汉文摩尼教文书与高昌的汉人教徒 .....	196
<b>第二节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宗教、世俗仪式</b> .....	204
<b>第三节 高昌地区的摩尼教教众与摩尼寺</b> .....	227
<b>篇末结语</b> .....	246
<b>结论</b> .....	249
<b>主要参考文献</b> .....	255
<b>部分引用论著缩略语</b> .....	293
<b>后记</b> .....	295

# 绪 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216~277)创立的一个宗教,它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诺斯替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形成了自身以“二宗(光明与黑暗)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为核心教义的独特信仰。在一篇粟特语譬喻文中,摩尼教徒们将自己的宗教喻为博大无垠的“世界之海”,而此前的各大宗教教派只是一条条的河流,最终它们都将汇流入海中<sup>①</sup>。有学者认为,摩尼教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宗教<sup>②</sup>,更被誉为真正世界性完美宗教的唯一代表<sup>③</sup>。但是,它的命运却并不完美。3世纪后半期,摩尼教被萨珊波斯斥为异端,严令禁断,教主本人被剥皮而死,教徒则四散逃亡。该教随之向西传至西亚及地中海周边国家,向东传入中亚、中国的西域(新疆)和中原地区。不久,摩尼教又在北非和罗马帝国境内遭到了教会和王权的双重压迫,被驱逐出来。然而,它却在东方,尤其是西域和中原地区存在了长达千年之久。这一早为本土所不容的“异端”,独独能在遥远的东方流传甚远,产生巨大影响,不能不让我们对它重新加以审视。因此,这就赋予了中国西域与中原摩尼教研究,在整个摩尼教学术领域中的特殊地位。

在20世纪之前,学界对摩尼教的基本认识几乎完全依赖于间接材料,

---

① W. Sundermann, *Ein manichäisch-soghdisches Parabelbuch, mit einem Anhang von Friedmar Geissler über Erzählmotive in der Geschichte von den zwei Schlangen* (Berliner Turfan-texte XV), Berlin, 1985, pp. 19~28, 36. 文书编号为 T III T 601 (Ch/U 6914)、T III 2015 (So. 15000(5))和 T II D 2 (Ch 5554)。

② Iain Gardner & Samuel N. C. Lieu (eds.), *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③ J. P. Asmussen, “Der Manichäismus als Vermittler literarischen Gutes”, *Temenos* II, 1966, p. 8.

即古代与该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sup>①</sup>。但这些出于敌对势力之手的记载,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中伤、诽谤或歪曲的成分,他们笔下对摩尼教的描述也有失公允,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肇端于西方学界的摩尼教研究,在20世纪之前并未将注意力投向东方,甚至从未有学者意识到在东方,摩尼教有着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为辉煌的发展期。因此,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摩尼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比亚、欧洲和北非摩尼教的研究起步晚。20世纪初,这种研究状况终于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德国中亚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发掘了数千片摩尼教文书残片,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无疑成为东方摩尼教研究的破冰之举。

现约有上万片伊朗语和古代突厥—回鹘语摩尼教文书分藏于中、法、德、俄、日以及芬兰等地<sup>②</sup>。由于西方学界在原始材料和古代语言的掌握上有明显的优势,这一百余年间,国外学者在残片的语言、文字及释义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的研究速度远比国内要快,论著出版的数量也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摩尼教原有的认识。但西方的摩尼教专家多从语言学、教义学等角度来研究各类摩尼教出土文献,或由一些残片的释读来获取部分传教史的信息片段,应该说,他们在历史学层面上的研究略有欠缺。最早

---

① 批判摩尼教的基督教文献极其广泛,代表性的有成书于4世纪初的《阿基来行传》(*Acta Archelai*),波斯特拉的提图斯(Titus of Bostra)的《反摩尼教》(*Adversus Manichaeos*),以及4世纪末到5世纪初,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著作,如 *Anti-Manichaean Writings Collected in Corp. Script. Eccl. Lat.*, Vol. 25, Vienna, 1891~1892; *De Natura Boni*, Washington, 1955。此外,还有4世纪早期,一位柏拉图主义者——里克波利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Lycopolis)的反摩尼教文献(*Contra Manichaei Opiniones Disputatio*, A. Brinkmann (ed.), Leipzig, 1895)等等。有关摩尼教的伊斯兰史料,如9世纪的阿拉伯传记学家纳迪姆(al-Nadim)所著《群书类述》(*Kitab al-Fihrist*)一书,纳迪姆在书中直接转引了当时仍然存世的摩尼教经典原文。见 G. Flügel, *Mani, seine Lehre und seine Schrift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äismus. Aus dem Fihrist des Abū'l-faradsch Muhammed ben Isḥāq al-Warrāq, bekannt unter dem Namen Ibn Abi Ja'kūb an-Nadīm, im Text neben Uebersetzung, Commentar und Index zum ersten Mal herausgegeben*, Leipzig, 1862, pp. 4~80; Bayard Dodge (ed. & tran.), *The Fihrist of al-Nadi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Vol. I-II, New York, 1970。另有比鲁尼(al-Biruni)的作品,见 C. E. Sachau (ed.),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London, 1879; idem, *Al-Biruni's India*, London, 1887。19世纪末,闪米特学家帕格农(H. Pagnon)发现了另一重要资料——一位伊拉克聂斯脱利派大主教 Theodore bar Konai 的作品,其文中也大量引用了一部叙利亚语摩尼教宇宙论经典。见 H. Pagnon, *Inscriptions mandaites des coupes de Khoubaïr II*, Paris, 1899。以上有关反摩尼教的基督教文献据 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Brill, 1998; Madeleine Scopello, "Hegemonius, les Acta Arbelai et l'histoire de la controverse anti-manichéenne", R. E. Emmerick, W. Sundermann & P. Zieme (eds.), *Studia Manichaica IV*, Berlin, 2000, pp. 528~559。

② 具体的收藏情况,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对摩尼教的东方传教史进行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沙畹(Éd. Chavannes)与伯希和(P. Pelliot)。他们以汉文史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载为历史背景,通过对汉文摩尼教残片的解析,大致勾勒出该教在中古中国的发展脉络。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寻找有关中原和西域摩尼教的新材料,并进行各种文本残卷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东方摩尼教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目前对东方摩尼教的研究已有了长足发展,从近代学术史来看,国内外众多优秀学者对该教在中亚、唐代中原地区,以及漠北和吐鲁番的传播与兴盛史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材料不足,在许多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林悟殊先生在展望摩尼教研究的前景时,就曾指出回鹘摩尼教研究是可以进一步投入的领域之一<sup>①</sup>。笔者步入这一高深学术殿堂,虽不识深浅,但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对目前颇有争议的一些重要文书残片予以新的诠释,并结合相关中外史料,把残片中可能传达的信息镶嵌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以求构拟出摩尼教在几个世纪里,向东渐进的、曲折坎坷的动态传播历程,更为具体地呈现东方摩尼教,特别是高昌摩尼教的历史发展原貌。体现出这一见逐于他处,却能恒久于东方的“光明之教”生命力之所在。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摩尼教从古代伊朗逐渐东传,在中亚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然后于唐代正式传入中原。8世纪后半期,它被回鹘立为国教,其势力在高昌回鹘时期发展至顶峰。相比之下,唐以后的中原摩尼教却逐渐转入民间,最终消亡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摩尼教传播的这一时空顺序也是本书篇章排列的主要依据。以下即以此为序,就东西方学界对摩尼教东方传教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回顾。

### 1. 中亚(西域)

中亚等地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残片,以及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希腊语《科隆摩尼古卷》(*Cologne Mani-Codex*)<sup>②</sup>是研究摩尼教早期传播史的重

<sup>①</sup> 林悟殊《摩尼教研究之展望》,台北《新史学》第7卷1期,1996年,130页。

<sup>②</sup> R. N. Frye教授是最先提请人们注意该古卷重要性的学者之一,见R. N. Frye,“The Cologne Greek Codex about Mani”,*Ex Orbe religionum. Studia Geo Widengren oblata*, Vol. 1, Leiden, 1972, pp. 424~429;目前,《科隆摩尼古卷》已出有两个完整版本: A. Henrichs & L. Koenen,

要文书资料。其中,以前者与本书所要讨论的3世纪以后,摩尼教在中亚及西域地区的传播史关联最为密切。以下将着重介绍学界对中亚出土伊朗语残片的研究成果。

1904年,当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古队归国后不久,缪勒(F. W. K. Müller)就着手研究其发掘品中的一些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他对类似福音字体(Estrangelo)的摩尼教写本残卷进行考释,比定了部分摩尼教经中的若干残片,并首次辨认出一种当时尚无人知晓的方言,即后来由安德利斯(F. C. Andreas)考订出的粟特语<sup>①</sup>。他还对中古波斯语残片M 97中出现的早期基督教作品《赫马牧人书》引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提醒人们注意摩尼教在本源上所具有的犹太—基督教因子<sup>②</sup>。此外,缪勒对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双页文书(编号M 1),即著名的《摩尼教赞美诗集》(Mahnāmāg)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该文书中的赞美诗索引,成为日后从众多出土文书中检索并判定摩尼教诗歌的重要工具<sup>③</sup>。缪勒的学术贡献为摩尼教研究领域开启了一片全新的空间。

20世纪30年代以后,安德利斯与亨宁(W. B. Henning)发表了三篇有关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摩尼教文书的基础性巨著<sup>④</sup>。同时,亨宁还相继发表数篇论著,对残片文字的解读和传教史的考证有极大的推进作用<sup>⑤</sup>。二战期间,亨宁执教于英国,他的弟子博伊斯(M. Boyce)为德藏吐鲁番出土伊朗

---

“Der Kölner Mani-Kodex”, *ZPE* 19, 1975, pp. 1~85; *ZPE* 32, 1978, pp. 87~199; *ZPE* 44, 1981, pp. 201~318; *ZPE* 48, 1982, pp. 1~59; 以及 L. Koenen & C. Römer, *Der Kölner Mani-Kodex*, Opladen, 1988。《古卷》的部分英译参见 R. Cameron & A. J. Dewey (tr.), *The Cologne Mani Codex: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is Body”*, Missoula, 1979。《古卷》主要论述了摩尼的生平、创教以及早期的传教活动。它不仅为我们明确提供了摩尼在世时该教的传播情况,更成为继续探寻3世纪以后,该教向东发展的重要线索。但因《古卷》不属于本书所要重点讨论的范畴,遂暂不作具体介绍。

① 缪勒的研究成果见 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 *SPAW*, Berlin, 1904, pp. 348~352; idem,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istan II”, *APAW*, Berlin, 1904, pp. 7~117。

② F. W. K. Müller, “Ein Hermas-Stelle in Manichäischer Version”, *SPAW*, 1905, pp. 1077~1083。

③ Idem,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hnāmāg)”, *APAW*, 1912, pp. 1~40; 后收入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Leipzig, 1985, pp. 153~190。

④ F. C. Andreas & W. B. Henning, “Mitteliranische Manichaica aus Chinesisch-Turkestan” I, *SPAW*, 1932, pp. 173~222; II, *SPAW*, 1933, pp. 292~363; III, *SPAW*, 1934, pp. 848~912。

⑤ W. B. Henning, “Das Verbum des Mittelpersischen der Turfanfragmente”,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IX, 1933, pp. 158~253; idem, “Ein manichäisches Henochbuch”, *SPAW* V, 1934, pp. 27~35; idem, “Ein manichäisches Bet- und Beichtbuch”, *APAW* X, 1937。亨宁这三篇著作一直作为众多学者研究中的重要参考。

语摩尼教文书编纂了一部目录<sup>①</sup>。此后,宗德曼(W. Sundermann)也对摩尼教研究贡献甚大,他不仅发表了教会史文献的研究成果<sup>②</sup>,还对中古伊朗语宇宙论文书和譬喻文书<sup>③</sup>,以及各类伊朗语文书中出现的神、魔、人名作了精细的考释<sup>④</sup>。1996年,他又编订了早期书刊中吐鲁番出土伊朗语文书的图录<sup>⑤</sup>。在粟特语摩尼教文书方面,亨宁·基舍维茨(I. Gershevitch)、宗德曼、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吉田豊(Y. Yoshida)等都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sup>⑥</sup>。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阿拉伯文献<sup>⑦</sup>。它们是吐鲁番出土残片定性和分类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研究摩尼教传播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记载。

摩尼最初并没在萨珊王国的中心城市传教。据摩尼教文献记载,他选

---

① M. Boyce,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1960. 她对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书研究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另两部著作中: *A Reader in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Brill, 1975; *A Word-list of Manichaean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Brill, 1977.

② W. Sundermann, "Studien zur kirchengeschichtlichen Literatur der iranischen Manichäer I-III", *AoF* XIII, 1986, pp. 40~92; *AoF* XIII, 1986, pp. 239~317; *AoF* XIV, 1987, pp. 41~107; idem,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er Turfantexte XI), Berlin, 1981.

③ W. Sundermann, *Mittelpersische und parthische kosmogonische und Parabeltexte der Manichäer* (Berliner Turfantexte IV), Berlin, 1973.

④ W. Sundermann, "Namen von Göttern, Dämonen und Menschen in iranischen Versionen des Manichäischen Mythos", *AoF* VI, 1979, pp. 95~133.

⑤ W. Sundermann, *Iranian Manichaean Turfan Texts in Early Publications (1904—1934) Photo Edition*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Suppl. Series, vol. III), London, 1996.

⑥ 参见 W. B. Henning, *Sogdica*, London, 1940; idem, "Sogdian Tales", *BSOAS* XI, 1943~1946, pp. 465~487; idem, "A Sogdian Fragment of Manichaean Cosmogony", *BSOAS* XII, 1947~1948, pp. 306~318 等等,以及 I. Gershevitch, *A Grammar of Manichaean Sogdian*, Oxford, 1954; W. Sundermann, *Ein manichäisch-soghdisches Parabelbuch, mit einem Anhang von Friedmar Geissler über Erzählmotive in der Geschichte von den zwei Schlangen*, Berlin, 1985;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IJ* 18, 1976 (1977), pp. 43~82; idem, "The Sogdian Fragments of Leningrad", *BSOAS* 44/2, 1981, pp. 231~240; 吉田豊《ソグド語雜録(II)》,《オリエント》31—2, 1989年, 165~176页;《ソグド語雜録(III)》,《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V, 1990年, 91~107页; 吉田豊 & W. Sundermann《ベゼクリク・ベルリン・京都——ソグド文字によるマニ教パルティア語の賛歌》,《オリエント》35—2, 1992年, 119~134页; 以及吉田豊先生对1981年柏孜克里克65号窟出土的三件粟特文书信的解读, 参见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3~186页。

⑦ B. Dodge (ed. & tran.), *The Fihrist of al-Nadi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Vols. I-II, New York, 1970; 作者纳迪姆在书中详细记载了摩尼的生平、教义以及该教在伊斯兰教国家的发展命运。该书是所有非摩尼教文献中记载摩尼教事实最为详尽、丰富和可靠的。此外,还应当注意《塔巴里年代记》中的有关记载, 参看 Ehsan Yar-Shater et al. (eds.), *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1996.

择了伊朗东部边境的土兰(Tūrān)和马库兰(Makrān)作为传教的早期起点<sup>①</sup>。宗德曼认为,摩尼还游历了印度河谷地区<sup>②</sup>。亨宁通过对相关残片的研究认为,摩尼曾派弟子阿莫(Ammō)前往帕提亚地区<sup>③</sup>,而后者更东渡阿姆河(Amu Darya)进入粟特教<sup>④</sup>。有学者认为阿莫创立的教团始于摩尼在世之时,在摩尼死后一直存在,其发展顶峰期约在4世纪<sup>⑤</sup>。

由于材料有限,摩尼教在粟特及周边地区的具体流行情况不详,但其教团的存在在考古学上得到了佐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在Čač(今塔什干西南80公里处,距锡尔河岸8公里)“上寺”(年代从6世纪末~7世纪初,广义可从4世纪~7世纪间)出土了一批黏土制印玺,其中一枚5~6世纪印章上刻有“(摩尼)主教”一词,印证了此时塔什干附近的绿洲地区已存在摩尼教团<sup>⑥</sup>。而八九世纪时的吐火罗和七河流域地区也曾有摩尼教活动的痕迹<sup>⑦</sup>。此外,回鹘语残片 T II D 171 记录了阿尔胡(Arghu)怛逻斯(Talas)地区摩尼教团的存在。但学界对该残片的年代有不同意见,葛玛丽(A. von Gabain)认为在8世纪60~80年代之间<sup>⑧</sup>,克里雅什托内(S. G. Klyashtornyj)则将之定于9世纪中叶<sup>⑨</sup>。我们还需注意的是,有观

---

① Antonio Panaino, “Strategies of Manichaean Religious Propaganda”, *Turfan Revisited*, Berlin, 2004, pp. 249~255.

② W. Sundermann, “Mani, India, and the Manichaean Religion”, *South Asian Studies* II, 1986, p. 14; 后收入 C. Reck, D. Weber, C. Leurini & A. Panaino (eds.), *Manichaica Iranica. Ausgewählte Schriften von Werner Sundermann*, Serie Orientale Roma LXXXIX, 1, Rome, 2001, pp. 204~205; 宗德曼著, 杨富学译《吐鲁番文献所见摩尼的印度之旅》,《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 132~135页。

③ W. B. Henning, “Waručān-Šāh”,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XI, 1945, p. 87; idem, “Mitteliranisch”, *Iranistik; Linguistik*, Leiden, 1958, pp. 20~130.

④ 中古波斯语残片 M2 记述了阿莫欲渡过阿姆河, 却遭到了女河神的阻拦,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女神的许可。该残片见 F. C. Andreas & W. B. Henning, “Mitteliranische Manichaica aus Chinesisch-Turkestan II”, *SPAW*, 1933, pp. 302~306; M. Boyce, *Reader*, p. 40; H.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Parables, Hymns & Prayers from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93, pp. 203~204。林悟殊先生认为, 虽然该残片颇具神话色彩, 但它使人相信阿莫确实已渡过了阿姆河。见林悟殊《早期摩尼教在中亚地区的成功传播》,《摩尼教及其东渐》,台北, 淑馨出版社, 1997年, 37页。

⑤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The Parthian *mwqr’nyg b’s’h*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M 4aI V 3—16)”, *ARAM, Mandaeans and Manichaeans* 16, 2004, pp. 95~107.

⑥ V. A. Livshits, “Sogdian Sanak, a Manichaean Bishop of the 5<sup>th</sup>-early 6<sup>th</sup> Centuries”, *BAI* XIV, 2000, pp. 47~54。Čač 即《大唐西域记》中的“赭时国”, 唐言石国。见(唐)玄奘、辩机原著,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83页。

⑦ 《中亚文明史》第3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年, 117页。

⑧ A. von Gabain, “Steppe und Stadt im Leben der ältesten Türken”, *Der Islam* 29, 1950, p. 52.

⑨ Sergej G. Klyashtornyj, “Manichaean Monasteries in the Land of Arghu”, *Studia Manichaica* IV, pp. 374~379.

点认为早在7世纪后半期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属古代黠戛斯领土),摩尼教可能就已存在<sup>①</sup>。

目前,对西域地区摩尼教早期传播史的认识并不很清楚。刘南强(S. N. C. Lieu)认为,在萨珊本土教徒逃难至中亚地区时,塔里木盆地已存在摩尼教团<sup>②</sup>。在一个内容与愤怒和贪婪有关的帕提亚语、回鹘语小残片(T II D 180)上,记有:“他(摩尼)的教法是在‘伟大开端(uluγ bašlay)’(那几年)的第二年从中国传来的……”。邦格(W. Bang)与葛玛丽推测,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摩尼教法就传至吐鲁番<sup>③</sup>。当然,对于“上元”也有不同的理解。拉赫玛提(A. R. Rahmeti)认为它是唐肃宗上元年号(760~762年)，“上元”的第二年为761年<sup>④</sup>。羽田亨则认为,摩尼教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延载元年(694)之前<sup>⑤</sup>。而762年之前,焉耆已建有摩尼寺,因为762年前后,《摩尼教赞美诗集》的抄写就是在焉耆的一所摩尼寺中进行的<sup>⑥</sup>。亨宁认为,到9世纪初,漠北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期,摩尼教团已遍布北庭、高昌、龟兹(包括疏勒和拨换)、焉耆、Uç(温宿,即本书的于术)等地<sup>⑦</sup>。

① 见 O. Maenchen-Helfen, “Manichaeans in Siberia”, W. J. Fischel (ed.),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Berkeley-L. A., 1951, pp. 311~326。汉译本见杨富学译《西伯利亚岩刻所见黠戛斯摩尼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322~337页。

② S. N. C. Lieu, “From Iran to South China: The Eastward Passage of Manichaeism”, David Christian & Craig Benjamin (eds.), *Worlds of the Silk Roads: Ancient and Modern* (Silk Road Studies II), Brepols, 1998, p. 9。但文中并没提出明确坚实的证据来证明此观点。

③ 见 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SPAW, 1929, p. 425。参看 H. -J. Klimkeit, *Gnosis*, p. 368。对于教法传达的地点,芮传明先生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应是“中原王朝北方境外”,似指突厥人地区。见氏文《唐代摩尼教传播过程辨析》,《史林》1998年第3期,23页。

④ Arat R. Rahmeti, “Der Herrschertitel Iduq-qut”, *Ural-Altäische Jahrbucher.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uralische und altaische Forschung*, Societas Uralo-Altaica XXXV, Wiesbaden, 1964, pp. 150~157; 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29页。李树辉先生也赞同这一年代判定,见氏文《试论摩尼教消亡的时间》,《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111页。

⑤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39页。

⑥ F. W. K. Müller,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äischen Hymnenbuch (Mahnāmag)”; W. Sundermann, “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 P. Bernard & F. Grenet (eds.), *Histoire et culte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aris, 1991, pp. 283~288; H. -J. Klimkeit, *Gnosis*, p. 274。

⑦ 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SOAS IX. 1938, pp. 565~571。其中对于Uç地名的考证, Henning疑为“温宿”,森安孝夫亦作“温宿”,见氏文《增補: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奪戦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勢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史論叢》3,东京,1979年,213~215页。吉田豊作“于术”,参见 Y. Yoshida, “Review of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sup>e</sup>-X<sup>e</sup> siècle de Touen-houang*”, IJ 36, 1993, pp. 366~367。本书取“于术”说。

## 2. 唐代中原

首先是对该教传入时间的探讨。武后延载元年(694)是摩尼教在中国合法传播的开始,此点已无异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延载元年并非该教传播中原的真正起点,学界对此有三种分歧,即唐以前<sup>①</sup>、唐高宗时期<sup>②</sup>和延载元年<sup>③</sup>。学者们由于暂时无法找到具体而明确的史料来证明各自的观点,所以,要给摩尼教入华加一个明确的时间定义还十分困难。此外,有观点认为,将拂多诞引见给武则天的人,是“召诸蕃王,建造天枢”的波斯驻华大首领阿罗憾<sup>④</sup>。由于摩尼教在武后时正式传入这一史实,有观点认为武则天在执政之际,其宗教信仰中已融入了摩尼教因素<sup>⑤</sup>。

该教传入之后,它的命运在开元年间发生了较大转折。就在《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写成的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年(732)七月,玄宗敕令该教不得在汉人中传播,胡人则不问<sup>⑥</sup>。关于禁断原因有很多学者讨论过。他们大多将目光转向《仪略》,希望从中找到答案。林悟殊认为,摩尼教的禁断应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玄宗很可能是受到佛僧的极力挑拨,才下了这道敕令<sup>⑦</sup>。刘屹则认为,《仪略》突显了摩尼教自身特色,同时又否定了李唐所认可的道教神

---

① 参见蒋斧《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150页;重松俊章《唐宋時代の末尼教と魔教問題》,《史渊》12,1936年,85~143页;柳存仁著,林悟殊译《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36~61页;以及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文史》第18辑,1983年,69~81页。此外,林梅村则引用唐人所著《灵鬼志》上的一段记载,认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是目前所知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见氏文《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393页。但“东晋说”似乎欠缺证据。

② 持此观点者主要依据的是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中“慕阇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的记载。见 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89; 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39~140页。

③ 沙畹、伯希和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8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43~104页;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329~397页。

④ Antonino Forte, “On the so-called Abraham from Persia.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Appendix in Paul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Kyoto, Paris, 1996, pp. 375~414. 汉译文见黄兰译《所谓波斯“亚伯拉罕”——一例错误的比定》,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附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59页。

⑤ 柳存仁《武则天先世来源之推测》,《和风堂新文集》(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135页;芮传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史论丛》第68辑,2001年,32~61页;又见氏著《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29~344页。

⑥ 《通典》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29页。

⑦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1998年,8页。王见川则认为,玄宗并非受到佛僧的蛊惑才禁断摩尼教,而是把它当作佛教异端来禁止。参王见川《从摩尼教到明教》,151页。

学,于是遭到禁断<sup>①</sup>。上述观点实际分为两类。一种认为摩尼教“披上”释氏外衣、冒称佛教,另一种则认为摩尼教“脱下”佛教外衣、坚持本教特色才引致开元的禁断。笔者认为732年禁令或许与当时受宠一时的密教僧侣有关。

此禁令之后,摩尼教在中文史籍里几乎不见踪影,直到安史之乱时,回鹘牟羽可汗于宝应元年(762)率援兵入唐,收复洛阳。在那里,他遇见了几位摩尼师,并于次年(763)将他们带回漠北,立摩尼教为国教。代宗朝,该教依仗回鹘之势复兴于中原,建寺蓄僧<sup>②</sup>,回鹘遣使中也频繁出现摩尼僧。但七十余年后,武宗法难使该教在中原的势力遭到重创,几乎被连根拔起。

此外,要研究中原摩尼教传播史,一定要涉及三件重要的敦煌本汉文写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和《摩尼教下部赞》<sup>③</sup>。

### 3. 高昌回鹘

摩尼教何时传入漠北回鹘还难以确定。目前有两种推测,一种认为763年是其传入回鹘地区的开始<sup>④</sup>。一种认为763年之前,回鹘与摩尼教便

---

① 刘屹《唐开元年间摩尼教命运的转折——以敦煌本〈老子西升化胡经序说〉和〈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98页。

② 有关中原摩尼寺,除了在代宗许可之下,于大历三年初建的大云光明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史料留存,因而,中原摩尼寺的研究成果不多。学者们都比较谨慎,他们明确断言的是:在大历三年之前,中原可能没有摩尼教寺院。见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340页;沙畹、伯希和撰,冯承钧译《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136页,注30。但温玉成认为,龙门山西天竺寺是宝应元年的一座摩尼寺。见氏文《龙门天竺寺与摩尼教》,《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98~101页;林悟殊随即对此观点做了有力的反驳,见氏文《龙门天竺非摩尼教寺辨》,《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105~110页。但温先生仍在其《河南的景教、袄教与摩尼教》(《河洛文明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508~521页)中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推论摩尼教在中原立寺始于宝应元年。

③ 东西方学界对这三件文书本身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林悟殊先生和张广达先生都分别撰有详细的综述,笔者于此处不作蛇足之笔。前者见氏文《20世纪敦煌汉文摩尼教写本书述评》,段文杰主编《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430~435页;以及同作者所撰有关这三件汉文写经研究成果的百年回顾,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文化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69~574页;张广达《唐代汉译摩尼教残卷——心王、相、三常、四处、种子等语词试释》,《东洋学报》(京都)第77册,2004年,376~336页,收入《张广达文集·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95~348页。

④ 见沙畹、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63页;克里木凯特(H.-J. Klimkeit)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艺术》,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25页;程溯洛《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汉文部分看唐代回鹘民族和祖国的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20~28页。

早有接触<sup>①</sup>。陈垣先生认为“摩尼教之入回鹘，与入中国，其时代相去不远”<sup>②</sup>。他曾主张该教于延载元年(694)始入华，那么694年与763年是否“相去不远”？此观点语义模糊。研究一种宗教的流传情况应该和当时社会背景相联系，这和前面研究摩尼教入唐时间的思路应该是相同的。关于回鹘最终决定放弃萨满而改宗摩尼的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主要出于经济因素<sup>③</sup>，也有认为还牵涉到政治原因<sup>④</sup>，或宗教因素等<sup>⑤</sup>。总之，回鹘人的改宗对整个汗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亡于黠戛斯。西迁高昌后的回鹘部族依然信奉摩尼教。“公元九至十二世纪的高昌回鹘，是世界摩尼教的实际中心。”<sup>⑥</sup>摩尼教初传高昌的时间也是一个未定数。邦格、葛玛丽及克里木凯特(H. - J. Klimkeit)教授认为，可能早在唐高宗上元年间摩尼教就从中原传至吐鲁番地区<sup>⑦</sup>；也有认为摩尼教与天山之间稳定关系的建立约在8世纪中叶<sup>⑧</sup>；或认为在怀信可汗时代(795~808)，高昌已成为摩尼教根据地<sup>⑨</sup>。荣新江先生认为，803年漠北回鹘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团立稳脚跟，并渐

---

① 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61页；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正中书局，1975年；林悟殊《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136~144页；芮传明《唐代摩尼教传播过程辨析》，《史林》1998年第3期，20~27、60页；L. Clark, “The Conversion of Bugu Khan to Manichaeism”, *Studia Manichaica* IV, pp. 83~123. 持此观点的还有张美华《漠北回鹘的摩尼教信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53~57页；周耀明《从信仰摩尼教看漠北回鹘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15~22页；王艳明《摩尼教入回鹘考》，《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102~106页。

②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335页。

③ 林悟殊《摩尼教在回鹘复兴的社会历史根源》，136~144页。

④ 杨圣敏认为，当回鹘从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完全转化为阶级社会的国家时，天神崇拜的萨满教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见氏文《试论回鹘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73~79页。

⑤ 杨富学认为，与佛教相比，摩尼教的义理更为简单，相对于当时草昧初开的回鹘人来说更易于接受。见氏文《关于回鹘摩尼教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143~145页。

⑥ 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9~16页。

⑦ 他们的根据是前引残片 T II D 180, 见 W. Bang & A.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SPAW* XXII, 1929, p. 425; H. - J. Klimkeit, *Gnosis*, p. 368.

⑧ 赫尔芬著，杨富学译《西伯利亚岩刻所见黠戛斯摩尼教》；森安孝夫认为，在安史之乱时，摩尼教慕阇的驻锡地已迁移到了天山地区的高昌或焉耆，见 Takao Moriyasu, “Manichaeism under the East Uighur Khan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the Fragment Mainz 345 and the Kara-Balgasun Inscription” (Speech at College de France, May 14, 2003), *Osaka University The 21<sup>st</sup> Century COE Program Interface Humanities Research Activities 2002 \* 2003*, Osaka University, 2003(非卖品)。

⑨ 芮传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史论丛》第68辑，2001年，32~61页；又见《东方摩尼教研究》，329~344页。

渐广泛传播<sup>①</sup>。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封建化也是学者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主要围绕吐鲁番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寺院文书展开。文书照片由黄文弼先生首次发表在《吐鲁番考古记》中<sup>②</sup>,茨默(P. Zieme)向西方学界介绍了其内容,并进行了部分翻译<sup>③</sup>。耿世民先生对该文书进行转写、汉译,并认为它应成于9~11世纪间<sup>④</sup>。刘南强通过分析认为,当时的摩尼僧已背离或放松了苦行主义,积极卷入了回鹘王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sup>⑤</sup>。林悟殊赞同此说,认为摩尼教“在政治上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经济上也加入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行列”,僧侣“放松或忽视原始摩尼教苦行主义的原则,乃是其封建化的必然结果”<sup>⑥</sup>。而孙振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侣们仍坚持着摩尼教义的基本精神<sup>⑦</sup>。森安孝夫则认为,该教是回鹘政权保护下的特权宗教,其寺院经济可能与当地佛寺经济有关<sup>⑧</sup>。

高昌回鹘境内摩尼教寺院、洞窟遗址的研究是另一个热点。除了高昌城中的K和 $\alpha$ 寺遗址之外,吐鲁番地区应该还有一些摩尼教洞窟<sup>⑨</sup>。1909年,奥登堡(C. O. Ольденбург)在柏孜克里克辨认出38号窟(格氏25窟)的

---

① 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58~171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69~385页。

②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63页,插图81~86。

③ P. Zieme, “Ein Uigurischer Text über die Wirtschaft manichäischer Klöster im uigurischen Reich”, L. Ligeti (ed.),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Budapest, 1975, pp. 331~338.

④ 参见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6页;后收入作者《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54~382页;作者也曾用英文发表,见Geng Shimin,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 Monastery”, *CAJ* XXXV, 1991, pp. 209~230。对于文书年代,李树辉曾认为,该文书应颁发于贞元七年(791)秋至贞元八年间,参氏文《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写作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14~22页。

⑤ 刘南强著,林悟殊译《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24~37页。

⑥ 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

⑦ 孙振玉《从古文书看高昌回鹘摩尼教——对〈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21~28页。

⑧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137页;也见该书德译本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 Seidenstraße. Forschungen zu manichäischen Quellen und ihrem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Wiesbaden, 2004, p. 161。

⑨ 根据前述1981年柏孜克里克出土的八件摩尼教书信,有观点认为在9~10世纪,东方教区的慕闾就驻锡于高昌城中的K或 $\alpha$ 寺,但偶尔也会住在柏孜克里克。见吉田豊《粟特文考释》,《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3~4页。